

试论清代甘肃的乡试

魏 静

(甘肃省社会科学院,甘肃 兰州 730070)

[摘要]清代的乡试是介于童试和会试之间的一级科举考试,其应中者为举人,是清代极为重要的一级科考。清代甘肃建省后,直到清末陕甘分闱,甘肃乡试一直和陕西合闱。本文就以陕甘分闱为界限,对甘肃乡试的历史状况进行分析探讨,以期对今后此方面的研究有所裨益。

[关键词]清代;甘肃;乡试;左宗棠

[中图分类号]K249 [文献标识码]A [文章编号]1005-3115(2012)10-0007-03

清代的科举目取士承袭明代的八股文取士制度,所谓“制义”,就是以“四书五经”来命题取士。每三年于直隶各省举行的考试称为乡试,中试者称为举人。举人于次年参加设于京师的会试,中试者为贡士。清顺治元年(1644),定子午卯酉年的八月为乡试,辰戌丑未年的二月为会试(乾隆年间改为三月),乡试、会试每试定为三场。顺治二年(1645),颁布科场条例,考试内容主要是“四书五经”,“四书主朱子集

注,易主程传、朱子本义,书主蔡传,诗主朱子集传,春秋主胡安国传,礼记主陈澧集说。其后春秋不用胡传,以左传本事为文,参用公羊、谷梁……乡、会试同”。^①古代科考对应试者身份有一定限制,如娼优、隶皂之家出身者以及父母居丧期间都不准参加考试。考试要求也十分严格,书写不工整,书写内容过多超过篇幅,交白卷,涂抹、污染太重,文章起讫虚字相同,表失年号,行文不避庙讳、御名以至圣号等,以违

北宋政府为加强对河北路兵力的统驭,以更好地发挥军队的战斗力,庆历八年(1048),将河北路划分为四个安抚使路:大名府路、高阳关路、真定府路、定州路。朝廷规定,四路安抚使均由治司所在州的知州兼任,“置河北四路安抚使,命知大名、真定府、瀛、定州者领之”。^②大名府路安抚使治大名府,统领北京、澶、怀、卫、德、博、滨、棣州、通利、保顺军。真定府路、定州路、高阳关路都与辽朝接壤,均在大名府路的北部,只有大名府远离宋辽边界,成为其他三路依托与后方基地,把与辽接壤的其他三个安抚使路与京东西路、京东西路、京畿路、京西北路隔开,形成最后一道保卫开封府的屏障。北宋政府从各角度加强大名府的军事防御功能,

从而使大名府的军事地位达到一个空前的高度,大名府军事防御能力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提高。

大名府在抵御契丹南侵中发挥的积极防御作用是值得肯定的,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北宋设置大名府防线的军事目的。辽军始终未能渡过黄河彻底击败北宋。“澶渊之盟”时,由于大名府在后方的坚守,客观上加重了辽军的后顾之忧,从而使盟约能较为顺利地签订,为北宋带来了相对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。大名府防线的巩固,有效地扼守了黄河防线,增强了宋军抗辽的信心。大名府凭借本身强大的军事实力和独特的地理位置,成为巩固北宋中央集权,抵御辽、金军队入侵的有力军事屏障。

[注 释]

- ①宋·欧阳忞撰,李勇先、王小红点校:《舆地广记》卷5《四京》,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。
- ②元·脱脱等:《宋史》卷86《地理二》。
- ③明·李肇撰,周宝珠、程民生点校:《汴京遗迹志》卷18,中华书局点校本1999年版。
- ④宋·叶隆礼:《契丹国志》卷3《太宗嗣圣皇帝下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。
- ⑤清·顾祖禹:《读史方輿记要》卷16《北直七》,中华书局点校本2005年版。
- ⑥元·脱脱等:《宋史》卷196《兵志十》。
- ⑦宋·韩琦撰,李之亮、徐正英点校:《安阳集编年笺注》卷31,巴

蜀书社2000年版。

- ⑧美·罗文:《北宋安抚使制度的渊源》,《国际宋史研讨会论文集》,河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。
- ⑨宋·李焘: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20,太平兴国四年正月癸卯。
- ⑩元·脱脱等:《宋史》卷266《李至传》。
- ⑪宋·李焘: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45,咸平三年十二月甲子。
- ⑫宋·李焘: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45,咸平二年十二月丙子。
- ⑬宋·李焘: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46,咸平三年三月戊寅。
- ⑭元·脱脱等:《宋史》卷324《石普传》。
- ⑮宋·李焘: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136,庆历二年五月戊午。
- ⑯宋·李焘: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164,庆历八年四月辛卯。

试论,不准再参加考试。清代乡试中额各省多寡不一,依文风之高低、人口之多寡、丁赋之轻重而定。如乾隆年间共取1200余名。乡试正榜取中者称举人,此外每正榜五名取副榜一名,亦称副贡。“雍正间小有增减,惟陕、甘以人材壮健,弓马娴熟,自康熙迄乾隆,先后各增中额三十名。咸、同间,各省输饷广额如文闱例。综计顺天中额百十,汉军四十,奉、锦三,江南八十一,福建六十三,浙江、四川各六十,陕西五十九,河南五十五,江西、广东、甘肃各五十四,山西五十,山东四十八,云南四十二,广西三十六,湖北三十五,湖南三十四,贵州二十五。”^②从上述资料可以看出,陕甘分闱前,甘肃乡试中额者,即考中举人者和全国相比居中等程度。陕甘分闱前,甘肃士人应考乡试极为不便,必须远赴陕西,这严重制约了应考者人数,在这种局面下,甘肃中额数却保持了较好的状态,说明清代甘肃不乏人才。乡试考试的地方称贡院。甘肃省于清光绪年间与陕西分闱后,在省城兰州始创建贡院,“纵百四十长,横九十丈,外筑城垣,内建棘闱,中为至公堂,前为明远楼,左右为南北号舍……大门左右有廊,有点名厅,有搜检厅……门外迤南为外官厅,为外供给所。至公堂后有牌房栅栏,栏内南为执事委员厅,北为受卷所。后为观成堂,前有水池,池有桥……南为监临总督署,为提调道署,监临署后为内供给所,署东为对读所、为弥封所,北为监试道署,署东为各房科为誊录所、为收掌所……官厅门内左为内监试署,右为内收掌署,中为衡鉴堂……后为雅门……东为录榜所”。^③从史料记载可以看出,当时的甘肃贡院规模宏大,建制完备,为更多士人应考乡试提供了便利。

一、陕甘分闱前的甘肃乡试

清康熙三年(1664),改陕西右布政使司为巩昌布政使司,次年改为甘肃布政使司,甘肃始建省,并设甘肃巡抚驻扎兰州。乾隆年间改临洮为兰州府,后设总督兼管巡抚事宜。甘肃地处西北边荒,在军事上又属要地,武备建设较受重视,而文治相较其他各省显得落后。以贡院为例,多数省份在督抚驻扎处都设有贡院就近取士,惟独甘肃乡试设在陕西举行,陕甘学政驻扎于陕西三原,每隔三年到甘肃巡视一次,同治回民起义后,竟有10多年没来过甘肃,这种局面十分不利于甘肃乡试的人才选拔,正所谓“甘肃士人经明行修,能自淑其乡里者,尚不乏人。至擢科登第以文章经济取重当世者,概不多见”。^④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方面:

(一) 乡试路途遥远

清代,甘肃府、厅、州、县距陕西稍近一些的只有平庆泾巩道和秦阶道,八九百里到1000里的路程;兰州道距陕西近者1300多里,远者要1600多里;而凉州、甘州、西宁乃至宁夏距陕西远超过2000里;肃州安西道则长达三四千里。道路遥远崎岖仅其一,气候恶劣,特别是夏秋季节,雨水较多,更使应考者行路艰难。据史书记载:“士人赴陕应试非月

余、两月之久不达所。”^⑤

(二) 劳资耗费大

甘肃士人赴陕西应考乡试,不仅路途遥远,耗资也很大,其中包括雇用车马、饮食、牲口草料等费用,“少者数十金,多者百数十金。其赴乡试盖于东南各省举人赴会师劳资相等”。^⑥由于资斧无措,不能远行,清代甘肃士人中毕生没有参加过乡试的甚为普遍,有的即使筹集了赴考资金,而返程因资斧耗尽,“抑郁成疾以没者”也不在少数,真正抵陕完试者不到3000人,只占到总数的十之一二,这严重制约了甘肃人才的选拔。

二、左宗棠奏请陕甘分闱及其具体措施

陕甘总督左宗棠看到甘肃乡试的不利局面后,力主改变这种落后面貌。为了利于甘肃乡试人才的选拔,必须在甘肃创设一个考场,实行陕甘分闱。左宗棠向朝廷奏请道,甘肃乡试赴陕西道路远较各省险远,所以应援照湖、广、云、贵等省乡试分闱取士的情形,并仿照甘肃武试分闱的已有旧例,文试也实行分闱,俾“边徼寒微得照各省一律就近应试,则投戈讲艺,士气奋兴,文治之隆,可计日而待也”。^⑦左宗棠的奏请得到了朝廷的许可。在筹集资金创建贡院方面,左宗棠同时得到了甘肃官绅士人的赞助,“又据绅士前刑部主事滕炫、道员曹炯及汉回士绅等联名呈请捐建贡院,择定袖川门外地基,筹备砖瓦、材木,已有头绪”。^⑧左宗棠倡议本省各州、县捐献银50万两,在省城兰州萃英门内修建贡院,除了创建贡院,陕甘分闱还涉及其他一些具体事宜。左宗棠的具体措施如下:

(一) 分定额数

清中前期,陕甘合闱时,定额是62名,陕西分得额数远多于甘肃。陕甘分闱后,必须重新确定陕西和甘肃的取中额数。左宗棠认为,如果将两省额数平分各占一半,对陕西则不公平,因为陕西应试人数一直多于甘肃,甘肃如占额一半,那陕西中额人数必然减少。由于同治年间回民起义,致使甘肃应试者总数稀少,左宗棠初到甘肃时,甘肃取中额数一直以21名为定案,但这21名并不是甘肃的定额,回民起义平定后,甘肃应试人数大幅度上升,21名的定额就显得太少了。道光、咸丰年间,甘肃每榜曾取士30余名。同治回民起义以来,各府、厅、州、县要捐派一定的粮料饷需,战乱导致人口凋敝,物价昂贵,而各府、厅、州、县历年来捐输各款为数甚巨,正因为如此,清政府规定的“永广中额”也就无从推广。为此,左宗棠认为,应比照各省中额最少之贵州,每科取中40名,满营应试士子每科取中2名,总共是42名。最后清廷议定甘肃为40名,其中增额9名,广额10名,近科分额21名。“光绪元年,陕、甘分闱,取中陕西四十一,甘肃三十。咸、同间,各省输饷辄数百万,先后广中额。四川二十,江苏十八,广东十四,福建及台湾十三,浙江、湖南、湖北、江西、山西、安徽、甘肃、云南、贵州各十。”^⑨

(二)分设学政

清代的学政,也称提督学政,省各一人。“以侍郎、京堂、翰、詹、科、道、部属等官进士出身人员内简用,各带原衔品级,掌学校政令,岁、科两试。巡历所至,察师儒优劣、生员勤惰,升其贤者、能者,斥其不率教者。凡有兴革,会督、抚行之。”^{①②}陕甘分省后,乡试一直合在一起,学政也只有一个驻扎于陕西三原。康熙元年(1662),江南分省,雍正二年(1724),便分设学政。湖广分省后也于雍正二年分闱乡试,陕甘分省的时间和江南、湖广相差不多,但分闱和分设学政却远在其后。^③左宗棠建议应设甘肃正、副考官各一名,设甘肃学政一名,使甘肃士子得以就近乡试而岁科按期举行,学政也可以免去长途跋涉之劳。“光绪二年,增置甘肃学政一人。先是甘肃岁、科试由陕西学政兼理,至是始置。”^④

三、陕甘分闱的意义

左宗棠任陕甘总督后,对甘肃民风民俗存在的问题颇有体会,他认为甘肃“民俗凌夷……不但劫杀争夺视为故常,动辄啸聚多人恣为不法,而民间伦纪不明……干名犯义之案诛不胜诛”。^⑤究其原因,左宗棠认为,主要是甘肃汉族和少数民族杂居相处,风俗习惯相互浸染很深,特别是汉族儒风渐为颓败。为此,左宗棠决心下力改革,主要是刊印“四书五经”小学善本分发各府、厅、州、县,鼓励多设汉回义塾,延聘老师给童生训课儒书。其次是实行陕甘分闱,派学政按期校阅,以达到“经正民兴”的作用。经过左宗棠对甘肃教育的兴革,甘肃的文风、民风大有起色,具体表现在:

(一)民多敦崇儒术,讲习六经,书院、义学得以振兴

陕甘分闱使甘肃教育风气焕然一新,民多敦崇儒术,讲习六经,同时也推动了书院和义学的振兴。左宗棠于同治五年(1866)任陕甘总督,同治七年(1868)进驻泾州后,开始颁发“四书”、“五经”,以期复兴甘肃士风。同治十三年(1874),左宗棠鉴于甘肃连年战乱,经史书籍焚毁殆尽的局面,奏请清政府准予在浙江严州府设置官书局,刊刻大版“四书”、“五经”,并令“校对精严,句读清楚”,然后运往甘肃各府、州、县,以解急需。^⑥此外,左宗棠还提倡兴办书院、义学,为更高一级的乡、会试储备人才。清代书院的性质是“辅学校所不及”,初于省会设之,之后为造就更多的人才,各省府、州、县次第建立,延聘经明行修之士为掌教。此外还有义学、

社学。社学,乡置一区,择文行优者充任社师,免其差徭,由官府给予一定的生活物资,凡近乡子弟12岁以上令入学。义学,由各省府、州、县设立,教孤寒生童,或苗、蛮、黎、瑶子弟秀异者。据史料记载,在兰州府,仅光绪三年(1877)左宗棠亲自创办的义学就有崇文义学、讲义学舍、河口义学、三门义学、古城义学、阿干义学等。此外,左宗棠还注重在回族地区兴建义学,同治八年(1869),左宗棠在陇东时“立(回民)义学强令读书,习礼仪”。同治十三年(1874),又令地方一律兴办义学,“设立汉回义塾,分司训课,冀耳濡目染,渐移陋习”。^⑦清代,甘肃的兰山书院算是全省最好的学府。同治年间,甘肃回民起义后,左宗棠因忙于战事,嘱咐甘肃布政使崇保代发院中膏火,在收到院生书信后,左宗棠亲笔批道:“览呈诸生之禀,文理尚可,殊为欣然。本爵大臣四十年前一贫士耳,然颇好读书,日有粗砺两孟,夜有灯油一盏,即思无负此光景。今年垂耳顺,一知半解,都从此时得来;筋骨体肤,都从此时练就。边方无奇书可借,惟就‘四书’、‘五经’及传注,昼夕潜心咀嚼,便一生受用不尽。事平至兰州,当课诸生背诵也。”^⑧上述记载反映了左宗棠对书院教育的关心和重视。光绪元年(1875),左宗棠还对兰山书院进行了修葺。经过诸多教育兴革举措,特别是陕甘实行分闱后,甘肃文风、民风出现了新的面貌,正如左宗棠所讲:“迩来汉民敦崇儒术,讲习六经,回民亦颇知。向慕争请设立义塾,延师课读儒书。”^⑨

(二)贡院的创建使甘肃乡试应考者人数得以上升,同时也造就了更多人才

光绪元年(1875)八月,在新建成的甘肃贡院进行第一次乡试,与试者即达3000人,是往年前往陕西参加乡试者人数的几倍。左宗棠不但奏请简派考官,他自己更是以陕甘总督的身份亲临贡院并落座督考。甘肃的第一次乡试,朝廷允准甘肃士子中可取中21名举人,经争取准予30名,至光绪二年(1876)增至40名。当年第一名解元是兰山书院的安维峻,以才学和人品深得左宗棠赏识。自光绪元年(1875)始,至三十年(1904)科举废,甘肃共选取举人681名,考中进士116名,超过了分闱前200余年甘肃中举人中进士人数之总和,为甘肃文化教育的进步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。

[注 释]

①②⑨《清史稿·志八十三·选举三》。

③④⑤⑥⑧⑬⑰《甘肃新通志卷三十三·贡院》。

⑦左宗棠:《左宗棠全集·奏稿》卷5,第559~560页。

⑩⑫《清史稿·志九十一·职官三》。

⑪秦翰才:《左文襄公在西北》,岳麓书社印行1984年版,第268页。

⑭傅九大:《甘肃教育史》,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,第259页。

⑮左宗棠:《左宗棠全集·奏稿》卷44,引自朱解林著《甘宁青民族教育史简编》,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。

⑯左宗棠:《左宗棠全集·批札》(三卷),第43页。